

“編輯學者化”及其背後的身份焦慮再議

——答劉石、陳穎教授等友人

朱 劍

[提 要] 關於編輯身份焦慮和“編輯學者化”討論的兩篇拙文 2018 年三四月間發表後,業界呼應和批評的聲音都有,本文則是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聲音的回應,並再次論證了以下觀點: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始於 1970 年代末,自此開始日趨剛性化的編輯職業化是引起焦慮的原因,“學者化”在進入學報界後很快即成為編輯身份重建的目標和路徑,但以職業化為前提的討論註定不能解除編輯的身份焦慮,走出焦慮的唯一路徑只能是學術期刊與編輯一起回歸學術共同體。

[關鍵詞] 學術期刊 高校學報 身份焦慮 編輯學者化 編輯職業化

[中圖分類號] G23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30-13

當筆者於 2017 年 10 月終於寫完了幾年前就已動筆的《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 年學術期刊史的一個側面》(以下簡稱《如影隨形》)一文時,仍覺意猶未盡,限於篇幅,該文對編輯身份建構重要一環的“編輯學者化”討論着墨太少了,而這個問題的討論不僅持續時間長,且在長達三十年的討論中,參與者前後有幾代編輯人,這一話題在不同的階段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以至於其來龍去脈日漸模糊。面對這一紛繁複雜的現象,筆者有心為這個當代學術期刊史上繞不過去的問題做一個“結案”式的論述,於是,緊接著就寫下了《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以下簡稱《三十年》)一文。

然而,從拙文發表後的反響來看,“結案”的“雄心”大概是要落空了。在同年 4 月下旬於澳門召開的“華文學術期刊轉型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二十周年研討會”(以下簡稱“澳門會議”)上,“編輯學者化”及編輯身份焦慮問題“自然地成了主要話題之一”,《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3 期“總編視角”專欄“選擇了其中四篇來稿與關注此論題的同道友朋共享”。^①分別出自原祖傑、葉娟麗、陳穎和劉石教授(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略去稱謂)之手的文章,不僅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對“編輯學者化”和編輯身份焦慮的看法,而且對拙文的觀點或予呼應,或表質疑。顯然,圍繞學術期刊編輯身份和“編輯學者化”討論,尚有一系列問題需要進一步澄清,這些問題主要有:編輯身份焦慮始於何時?根源何在?是否如影隨形般地持續存在了四十年?在不同時期有何不同特點?應如何看待為擺脫焦慮而進行的身份建構?“編輯學者化”在其中又處於何種地位?能夠引導學術期

刊編輯走出焦慮的身份建構的根本途徑是什麼？等等。

其實，對於這些問題，拙文《如影隨形》和《三十年》皆有涉及。儘管討論重點有異，但前後寫成的兩文卻是一脈相承的：指出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的根源，分析以“學者化”為典型的身份建構路徑，指出最終陷於困境的原因，探討走出焦慮的路徑，是兩文的共同目的。為此，不可能不涉及上述諸多問題並給出自己的答案，不過，由於兩文均是按時間順序寫成，而上述問題時間跨度大多比較大，在不同時期往往又呈現出不同特點，相關討論不可避免地散落於全文。這樣的寫法雖然能夠比較有序地漸次展現四十年的全景，但對某些一直延續的具體問題卻無法集中地呈現和討論，從而造成了欲結案而不能的結果。蒙《澳門理工學報》再次慷慨惠予版面，讓筆者有機會對上述問題集中論述，並對幾位學者的觀點和質疑予以回應，由衷歡迎同道繼續批評。

一、什麼是“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

在寫作《如影隨形》一文之初，為明確地討論問題，筆者給“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作了界定：“本文所謂‘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指的是1970年代末以來學術期刊編輯對自己的權利、職責的內容是什麼、邊界在哪裡等問題，一直沒有一個得到學術期刊界及相關各界普遍認同的清晰描述和界定，因此無法準確地定位自己的角色而經常性地陷入某種焦慮狀態。在工作中常表現為不知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以及如何做好該做的、如何避免不該做的而舉措失當和無所適從；在情緒上則有著或者自卑、不安、惶惑，或者自負、狂妄、傲慢的憂慮或焦躁的某些傾向，自卑與自負實際上是身份焦慮的兩極，但有時也會因工作對象或環境的不同而在同一群體乃至同一個人身上交替出現。”^②之所以重複這一界定，是因為，在“澳門會議”上多位學者的發言，以及《澳門理工學報》的4篇回應文章，雖然大多沒有否認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至少曾經存在過這一事實，但對於什麼是“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卻有著不同看法，由此也導致了對焦慮何時和因何而產生，與“編輯學者化”討論有何關係的不同看法，故而只有明確“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之所指，才有可能將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問題說清楚，而筆者上述界定迄今並無變化。

在關於編輯身份焦慮的討論中，焦慮往往被視為因現實中編輯在待遇上普遍遠低於學者而產生的某種情緒上的不安。葉娟麗就指出：“無論是制度規定還是實踐操作，編輯都是一個遠低於學者的身份設計。”^③原祖傑、陳穎和劉石都有類似表述，而在1990年以後的“編輯學者化”討論中，對學報編輯地位和待遇低下的抱怨乃至控訴，以及改變境遇的迫切希望的表達更可謂比比皆是。

所有這些固然會導致編輯的焦慮，但筆者要強調的是：最初引起焦慮的並不是這些。此處有一個制度設計的初衷與現實呈現的時間差問題，制度設計一般不可能刻意地貶損某一行業的人，特別是在百業待興的1978年。從制度設計到落地，再到編輯與學者的身份差別的顯性化之間，存在著一段十分重要的時間，如果忽略了這段時間，那麼，我們就無法看清職業化與編輯身份焦慮之間的關係。這一點且待下文分析。這裡只是指出，即使到1980年代中期，也不存在學術期刊編輯在待遇上低人一等的問題，在學者的眼中他們的地位甚至還高於自己。所以，劉石問道：“編輯這一職業有沒有身份焦慮？如果有，是何時，是什麼焦慮？……又是以什麼時候為最甚呢？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遠的不說，新時期以來，年資稍長的編輯和學者可能都有體會，在相當長的時段裡……出版社和期刊社的學術編輯不僅是與學術界最緊密的職業，也是學術界最倚重的對象。說他們被學術界視作天之驕子也不過分。猶記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上，學術期刊編輯往往會受到特別的尊寵和禮遇……在那個年代，身份帶給編輯的其實

不是焦慮，恰恰相反，是驕傲，甚至驕縱。”^④其實，這種情況並非只存在於劉石所言的 1980~1990 年代，即使在他認定“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倒確實是存在的……近二十年左右”，某些編輯對“學術共同體的傲慢”（原祖傑語），又何止一般的驕傲和驕縱！在長時間受到學者“尊寵和禮遇”之後，他們已自封為“學術引領者”。對於這樣的自信心爆棚，許多同行都不免側目而視，陳穎就說：“已經擔任學報主編十多年的今天的我，也對學報界某些人士動輒妄談所謂‘學術引領’之豪言壯語感到臉紅心跳。”^⑤

劉石顯然是將編輯的這種驕傲、驕縱視為不存在焦慮的證據而特別舉出的，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編輯身份焦慮的另一種表現，或者說是焦慮的另一極。一個看似強勢而驕縱的人未見得就沒有身份焦慮。誠如葉娟麗所言：“當一個人從原來的身份改變成外在環境強加的另外一個身份時，他就會經歷強烈的思想震盪和巨大的精神磨難，出現身份認同危機。”^⑥

對於大多數學術期刊編輯來說，這種能夠導致身份認同危機的、由外在環境強加的身份改變，正是始於 1970 年代末而於 1980 年代呈顯性和剛性的編輯職業化。職業化所改變的不止是編輯的身份，更與一種行政賦權捆綁在一起，國家出版主管部門將原本屬於學術共同體的學術媒體（學術期刊）掌控權正式授予了學術期刊主編和編輯。對學術媒體的獨立掌控權，給予了編輯能在學者面前驕傲和驕縱的資本；當然，賦權的前提就是職業化。

賦權與職業化捆綁所引起的權力轉移，無論是學者，還是編輯特別是主編，都是心知肚明的。對於學術共同體來說，實質上其創辦學術期刊的權利喪失了，因為與學術共同體分離是成為主編和編輯的前提條件。如此一來，要想順利發表，就得屈從於編輯，這是編輯得到尊寵和禮遇的由來。對於主編和編輯們來說，則足以引起“強烈的震盪和巨大的精神磨難”。因為尚不能清晰地知道手中新獲得的權力的邊界和自己能力的邊界在哪裡的人，在意識到權力將給其帶來利益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兩方面的擔憂：其一，他們的實際能力和所承擔的責任與他們因權力而獲得的利益是否相符；其二，這樣的權力變動是否會得到學術共同體的認同。前者是自我認同，後者則是來自權力相關人的認同。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行使這一權力的合法性都難以得到保證，必然引發身份焦慮。當然，伴隨賦權而來的焦慮不可能一下子遍及所有編輯，而作為主要責任人的主編及骨幹編輯則會比較敏感。筆者在《三十年》中就曾指出學術期刊界有著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取向，他們的應對也有兩個向度：偏向責任或偏向權力。

偏向責任的應對更多的是一種內省而不易為群體外的人所察覺，原祖傑對此有十分精彩的分析：“那個年代（1980 年代——引者注）的大部分編輯應該是不存在身份焦慮的……所謂身份焦慮，應該主要存在於一批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編輯當中……他們所追求的，是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而不是滿足於個人的權力慾和存在感。……理想主義者不願意承認自己手中掌握著決定學者命運的權力，因為他們覺得那樣是本末倒置，是對學術共同體的僭越甚至背叛。”^⑦

表現出傲慢的編輯往往是現實主義者，還是原祖傑分析得到位：“帶有現實主義傾向的期刊編輯首先會接受現實中的各種安排，包括對編輯身份的定位和不可抗的各種政策轉變。然後他們會從實際出發，將個人命運與體制安排結合起來，在體制範圍內或者推動期刊的作用或者追求個人的利益……並試圖積極主動地利用學術指揮棒發揮引領作用。”^⑧這已不僅是態度上的驕傲或驕縱，實質上已成為理想主義者所擔憂的“對學術共同體的僭越甚至背叛”。然而，以傲慢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自信只是來源於權力而非自身的能力，合法性始終是他們的軟肋，所以，他們就會不斷地言說和證明自身所擁有權力的合法性，某些編輯對所謂“學術引領者”的不斷宣示大概即屬此列。當這

樣的言說並不能換來期待中的認同,甚至引來激烈批評之時,身份焦慮也就變本加厲了。當然,更多的恐怕是既不缺理想情懷又不願拋棄現實利益的人,這就會出現筆者所謂的“自卑、不安、惶惑,或者自負、狂妄、傲慢……在同一群體乃至同一個人身上交替出現”的情況。

由此可見,在職業化與權力捆綁的那一刻,身份的焦慮就已悄然潛伏進了編輯的心中。無論是因責任改變而引起的內省,還是因獲得權力而產生的傲慢,都能映射出編輯對新的身份難以準確定位而生出的焦慮。劉石所指出的編輯在學者面前的傲慢,實際上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編輯與學者的關係此時已發生了質性的變化,編輯已經不再是學術共同體內的成員,而成為需要禮遇的“另類”了。這一切,當然只能源於編輯身份的變化和權力的轉移。

二、焦慮始於何時,因何而起?

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始於何時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問題,而是與焦慮生成的原因緊密相聯的。不同的時間認定,是因為對引發焦慮原因認定之不同。原祖傑、葉娟麗和陳穎皆認同焦慮的根源在於職業化,而劉石則不認為職業化與焦慮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所以對焦慮因何產生以及產生的時間就有一個他自己的看法。

劉石質疑道:“就學術期刊而言,是否如文章(指《如影隨形》和《三十年》——引者注)所說,在1988年新聞出版署《期刊管理暫行規定》出台,明確規定‘有健全的編輯部、有符合本專業要求的專職主編及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學術期刊編輯才‘告別編研一體而正式走向職業化’,就是說,編輯職業化的時間是否如此之晚,這樣的判斷有沒有統計學上的依據、事實上好不好統計,都似乎值得再探討。”劉石認為編輯職業化遠早於1980年代,故而與《期刊管理暫行規定》無關。但只要回顧歷史就可知道,在此之前,職業化只是出現在走市場的出版界,並不存在於編研一體的學術期刊界。另需說明的是,筆者所謂“學術期刊編輯職業化”指的始終都是國家期刊體制對學術期刊編輯職業身份的設定,而且一直強調職業化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⑨但在1970年代末之前執行中有著相當的彈性,編輯與教師、科研人員的身份都可以比較自由地切換,此後才逐漸走向剛性。這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教育部1978年的《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實為職業化走向剛性的起點,而1988年新聞出版署《期刊管理暫行規定》則是第一個明確“專職主編”和“專職編輯”的具有法規效力的文本,所以筆者在“走向職業化”一語之前特別用了“正式”一詞,以示法規的難以甚至不可抗拒性。自從編輯註冊制在本世紀初完全剛性化後,即使沒有統計學上的依據,也可判定最遲至此編輯職業化已最終完成,此後殘存的編研一體現象,已是違法或違規行為了。

除此之外,促成學術期刊編輯身份改變的,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實務底層的態度。如果這樣的制度設計,除了出於頂層的意志外,還同時出於學報主編們的願望和要求,從而通過雙方“共謀”來完成的,那麼,我們還會認為這樣的制度是為了貶損學報地位而特別設計的嗎?在1970年代末這個特殊年代,這個不同尋常的事情就確實發生了。然而,制度設計初衷卻與結果相背離,學報主編們出乎預料地“收穫”了編輯身份認同的難題且觸發了焦慮。

這要從1978年說起。當一切皆為政治服務的“魔咒”逐漸解除,全國的工作中心開始向經濟建設轉移之時,與現代社會應有之分工相對應的“專業”與“專家”的意義方始凸顯。在以知識分子為主幹的諸多行業領域,在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的“洗禮”而已十分淡漠的職業意識終於“春風吹又生”了。說到職業意識,其前提當然是權力頂層和社會各界對某一個行業獨立性的

承認與尊重，而行業的獨立性標誌又在於只有這個職業的從業者方能具有的一系列不能被剝奪的權利。當時的權力頂層對於各業知識分子職業意識覺醒，不僅樂見其成，而且不乏主動推進。因為在工作中心轉移後，真心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離開了各行各業從業者自覺的職業意識，又當從何說起？正是在這個時間節點上，與多個行業一樣，作為知識分子的編輯，其職業意識也開始覺醒了。

但同樣是覺醒，出版界與學術期刊界的情況卻是不同的。出版界編輯職業意識的覺醒更確切地說是被“喚醒”的。1978年，國務院批轉的國家出版局《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明確提出“編輯人員的工作應該受到尊重”，^⑩國家出版局代局長陳翰伯更是親自動員：“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枷鎖，解決心有餘悸問題。”^⑪使得直到此時因政治歧視慣性而在出版社中地位仍然低下的編輯們看到了希望，^⑫他們在交織著餘悸、激動和希望的心態下，開始申言作為編輯應享有的權利，並由此逐漸展開了職業身份的建構，目標就是成為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識分子有同樣地位的獨立的職業群體。

學術期刊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直接受惠於國家刻意營造的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氛圍的首先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師和科研人員，其中就包括學術期刊編輯，他們本身就是學者。在高校，1978年時，創刊於1950年代的重點綜合性大學學報，經過“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正逐步回歸本原，加之新創的學報，逐漸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學報間的交往開始增多，在學報較為集中的華東、東北等地區，正在積極籌備成立學報組織，與教育部相關主管部門的聯繫也變得日益密切。各界知識分子職業意識的覺醒深深地觸動了部分高校學報的主編們，學報編輯能否通過教育部的行政授權而形成一個掌控學術媒體的獨立職業，成為當時學報主編們思考的問題。當然，要達此目的，主編和編輯的專職化就是題中應有之意。經過與教育部的積極互動，終於促成教育部於1978年11月發佈了《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只要讀一下《意見》，就可以知道教育部賦權之慷慨。今天的編輯們可能已很難理解和體會當年在各界知識分子眼中政治待遇之重要。在出版界編輯所表述的權利訴求中，令他們耿耿於懷的首先是政治待遇：“尊重編輯的權利，首先要尊重他們政治上應當享有的待遇。中央領導同志有關宣傳教育方面的內部講話，黨政機關連傳達室、司機班的同志都可以聽到，出版社卻只能傳達到編輯室主任一級。”^⑬可見編輯地位之低。不妨比照一下《意見》的規定：“編輯部的黨員主任、副主任（主編、副主編）應根據工作需要，閱讀發至校（院）黨委常委一級的有關文件。黨員編輯可閱讀系、處一級幹部能夠閱讀的文件。”^⑭主編、副主編得以享有校黨委常委的待遇，普通編輯可享有處級待遇，在今天已不啻天方夜譚。除了政治待遇，另一個重要待遇就是行政級別了，《意見》規定：“學報要在學校黨委直接領導下，設立編輯部……學報編輯部一般應相當於系一級或校（院）屬研究所一級的學術機構。”這大概是學報所能擁有的最高級別了。與政治待遇和行政級別配套的，是影響至為深遠的關於學報和編輯的性質及身份：“高等學校學報是以反映本校教學科研成果為主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要挑選有較高的政治水平和理論水平的幹部擔任編輯部主任、副主任（或主編、副主編），並積極創造條件，按文、史、哲、經、教等專業配備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以及必要的行政人員。”^⑮前者規定了學報的內向和綜合的性質；後者規定了編輯的“專職”性質。無論是政治待遇、行政級別，還是學報的性質和編輯的身份，都為學報的獨立地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應該說，《意見》的出台，充分尊重了學報主編們的願望，事實上，部分學報主編直接參與了文件的起草，^⑯他們的訴求在該文件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表述並不奇怪。筆者絲毫不懷疑參與起草

的主編們“把學報工作搞上去”的真誠動機，也深深體會到他們對自己獨立掌控學報的充分自信。而且，他們並非沒有對編輯專職化可能導致問題的警惕，這表現在他們促成《意見》明確地規定：“編輯人員的職稱、級別及其工作生活條件，均應按相應水平的教師辦理。”^⑩想必在他們看來，成文制度足以防範編輯身份變化可能帶來的最大風險，即在與教師相分離後待遇下降。

由此可見，《意見》的發佈的確是件特殊年代非同尋常的事：自上而下把工作“搞上去”的萬眾一心、各界知識分子職業意識的普遍覺醒、學報界行業組織的初興和職業意識的萌動、教育部與學報界的頻繁互動等諸多因素在同一時間點的匯聚，才造就了《意見》這樣的特殊文本。葉娟麗曾對30多年後出自學報主編們的另一個“底層設計”有一段十分到位的評論，用在這裡似乎也很合適：“表面看是源於大學學報主編們對未來發展的深層次的危機感；但從本質上，它仍然是出於各位主編對自己生存利益的一次理性算計。”^⑪儘管兩次算計有所不同：一是當年的主編們雖然不乏風險意識，但還不至於有危機感，相反，他們自信滿滿；二是《意見》不僅僅出於主編們的設計（算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謂權力頂層的教育部與實務底層的學報主編們的一次共謀。

雖然同為編輯，出版界與學術期刊界編輯身份建構的動因卻完全不同。雙方都看到了對方的優勢，可謂互為目的：出版界編輯要獲得如同期刊編輯已擁有的教師和科研人員那樣的良好待遇；期刊編輯則要獲得出版界編輯那樣獨立的職業地位。對方所擁有的，正是自己所缺乏的。對於出版界編輯來說，是因為地位低下而產生了身份焦慮，從而展開了身份建構；而對於學術期刊編輯來說，則正好相反，他們是從教師和科研人員優越的地位出發，為獲取他們所渴望的行政賦權，冒著失去這樣優越地位的風險，主動地轉換身份。儘管他們對行使這樣的權力充滿自信，但畢竟要以與久在其中的學術共同體相分離為代價，他們必須通過新的身份建構來重新定位自己與學者的關係，不僅要證明自己是與學術共同體能夠平起平坐的獨立主體，而且要證明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掌控原本屬於學術共同體的學術平台，乃至可以合法地依恃這個平台掌控權來指揮學術共同體的研究。

然而，理想雖然美好，現實卻很殘酷。儘管學報主編們為新的身份建構使出了渾身解數，但隨著“編輯中介說”、“編輯再創造說”等身份建構方案在辦刊實踐中的碰壁，學報及其編輯的聲譽和待遇也隨之止不住地滑了下去，“編輯人員的職稱、級別及其工作生活條件，均應按相應水平的教師辦理”的規定終成一紙空文，而編輯的職業化卻不可逆轉地日趨剛性。直到1988年，終於出現了“學報編輯學者化”這一新的身份建構方案。此時，距離1978年已過去了整整十年。在這十年間，參與制度設計的學報主編們的初衷已被學者們根本不信任學報編輯學術能力的殘酷現實基本擊碎，逐漸顯現、不斷加深的認同危機使得身份焦慮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因此，最初造成編輯身份焦慮的並不是待遇的低下，而是如何成功地重建與學者的關係。顯然，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編輯與作者的關係這個現實中的真問題都會一直困擾著他們。可見，專職化——身份焦慮——身份重建——重建失敗——地位下滑——更深的焦慮——更努力的重建——再次失敗……，如此的周而復始螺旋循環，邏輯關係是十分清晰的，身份焦慮的起點只能是1970年代末開始且日益走向剛性化的學術期刊編輯職業化。

三、如何看待身份焦慮和“編輯學者化”？

《如影隨形》和《三十年》都將“學報編輯學者化”討論的主要時段視為學報編輯為解決身份焦慮而進行的身份建構中最重要的一環。對此，原祖傑、葉娟麗和陳穎都予贊同，儘管對“學者化”之於身份建構作用的看法不盡相同，劉石則不認為兩者之間有何必要的關聯。劉石對“編輯學者化”

是這樣看的：其一，“學者化”出現的歷史語境與編輯身份焦慮無關，而是期刊界在推進自身職業化進程中的理論探索。其二，編輯作為一種職業，需要的是專業性，而不是高超的學術水平，意在提高編輯學術水平的“學者化”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有害。其三，編輯確實存在焦慮，但另有原因，非“學者化”所能解決。

我們先來看劉石的第一層意思，即“編輯學者化”的歷史語境。

劉石首先提出了質疑：“更關鍵的問題是，提出編輯學者化的歷史語境是不是編輯職業化帶來的身份焦慮呢？”“朱劍教授說，‘越來越剛性化的學術期刊編輯職業化’造成的身份焦慮導致了‘編輯學者化’的提出。其實任何一個稍微體面或正規一點的職業（更何況是編輯這個職業），很難想像其從業人員會集體因職業化而焦慮。”^⑩但在筆者看來，導致某一群體集體焦慮的原因只能是集體身份的改變，與該集體是否體面和正規似無必然關係。對於學術期刊編輯這一集體，身份改變從1978年開始確確實實地出現了，如果沒有身份焦慮，又何來一次次碰壁但仍鍥而不捨的對身份建構方案的探索和追尋呢？

那麼，劉石是如何看待“編輯學者化”的呢？他接著說：“我寧願反過來，將‘編輯學者化’看成是期刊界在推進自身職業化進程中的理論探索，是合乎歷史邏輯的正面主張。”劉石提出了他的理由：“要明瞭這其中的歷史邏輯性，有必要回顧一個不得諱言的事實，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高校學報……似乎成了高校安置關係戶的方便去處。總體而言，相較於一線教研人員，學報編輯的學歷和學力普遍較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為了學報的正常發展，有必要在編輯自身學術水平上下功夫，這似乎才是‘編輯學者化’主張出現的歷史語境……深層的原因或許正在這裡。”^⑪

劉石在這裡展現的歷史邏輯鏈是：學報是高校安置關係戶的首選之一——學報編輯學歷、學力普遍低——學報編輯必須提高學術水平——“編輯學者化”主張出現。然而，這個看似完整的鏈條卻有致命的缺環，那就是，邏輯鏈的起點不應在學報是“關係戶首選”，還應再往前追溯，學報何以成為“關係戶首選”的？當年《清華學報》、《北京大學月刊》可是聚集了學校一流才子的地方，學報之所以成為“關係戶首選”，必定有足以改變學報對人才要求的事情發生。符合這一條件的事情只能是改變了學報編輯與學術共同體關係的職業化，正是職業化中斷了編研一體的傳統，阻斷了學者與編輯的通道，才給了“關係戶首選”的機會。所以，邏輯鏈的起點即首項至少應在學報編輯職業化。當年無比輝煌的學報墮落至“關係戶首選”，正是發生在職業化引發了身份焦慮，而欲與學者平起平坐的身份建構卻頻頻失敗，並導致學報聲譽嚴重下降之時。所以，身份焦慮、建構失敗和聲譽下降應是邏輯鏈的次項。第三項才是劉石的第一項，即“關係戶首選”。至少需要添加前兩項才能將這條歷史的邏輯鏈補充得比較完整。如此，作為邏輯鏈末項的“學者化”，其與職業化、編輯身份焦慮和身份建構的關聯也就昭然若揭了。試想，如果沒有職業化，或者有職業化但身份建構成功了，學報還會成為“關係戶首選”嗎？而都已成為“關係戶首選”了，感覺再遲鈍的編輯也難免焦慮吧？集體焦慮的出現有什麼奇怪呢？到了這種地步時提出且持續討論了三十年“編輯學者化”又怎能單純地只是“自身職業化進程中的理論探索”和“編輯自身建設中的一個正面命題”，卻與試圖擺脫窘迫地位的編輯身份建構毫無關聯？

我們再來看劉石的第二層意思，即學術期刊編輯的專業性與“學者化”的關係。

儘管劉石將“編輯學者化”視為“正面主張”和“理論探索”，但他的“總體評價……卻是消極的”。表面上是因為在他看來，“學者化”對“編輯的職業提升或者說‘主體意識’的養成”的作用是“很難證實或證偽的事”，而實質上還在於他對學術期刊編輯職業化的認同。當然，他是用一種特

殊的“假設”隱晦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假設我們承認學術刊物的編輯是一種職業身份，那麼一種職業得以成為一種身份，裡面得有多少職業的素養等著去講求啊，比如對學術動向高屋建瓴的瞭解和敏感、對學術重點舉重若輕的分析和把握、對學術發展未來的預測以至引導、得體的人際交往能力與廣泛的學術人脈、學術文章寫作技巧方面的高人一籌等等。”^①在這裡，假設的前提是編輯乃一種“職業身份”，在此前提下的“職業的素養”則十分豐富。從劉石的表述中，我們可大致將其分為兩類知識或技能：一是學術能力；二是編輯技能。劉石斷言：“專業的學術水平卻不是最重要的條件，更不是唯一的條件”，而“學者化”卻是要“將之單獨提溜出來加以強化，於絕大多數的編輯個體不見得切合實際，於編輯這門職業更可能不僅無補還會有害。”如此強調編輯技能而忽略學術能力，可能連劉石也覺得說不過去，所以，他又舉出了另一個理由：“編輯某一專業的學術水平過高，必然是這一專業學者們的大不幸”，他還以錢鍾書為例，“如果讓他來作編輯，能入他法眼而僥倖見容的比較文學論文會有幾篇？一個刊物聚集了幾個錢鍾書，這樣的刊物還辦得下去嗎？有人說一流的學者只能由二流乃至三流的學者來培養，同理，一流學者的文章恐怕也只能由具有二流乃至三流學術水平的編輯來編發。”^②如此一來，“學者化”之於編輯職業身份的建構也就沒什麼積極意義了。劉石的確完成了他的論證，但是，他的論證似乎是有問題的。

首先，劉石在描述學術期刊編輯的職業素養時，對學術能力的要求不可謂不高，試想，“對學術動向高屋建瓴的瞭解和敏感、對學術重點舉重若輕的分析和把握、對學術發展未來的預測以至引導”，這樣的能力，即便位居學術前沿的一流學者也不敢如此自負吧？而不具專業水平且自外於學術共同體的“職業編輯”又何以能夠獲得？“引領”云云，除了劉石眼中傲慢的編輯外，還有誰敢輕言？其實，所謂“瞭解和敏感”、“分析和把握”、“預測以至引導”這套說辭恰恰來自於那些“學者化”的主張者，“學者化”的目的不就是試圖獲得這些能力以“合法”地指揮學者嗎？可見，在關於編輯的學術能力表述上，劉石與“學者化”的主張者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的是，轉眼之間，這些他極力推崇的能力就都成了“不是最重要的條件，更不是唯一條件”了，且馬上就對“將之單獨提溜出來加以強化”的“學者化”下了“不僅無補還會有害”的結論，大概是因為劉石也無法回答脫離了學術共同體而成為獨立職業的學術期刊編輯的學術能力從何而來的問題吧。

其次，在陳述反對“學者化”的理由時，劉石似乎忘了他所陳述的編輯的學術能力這一條件，而全盤接過了三十年爭論中那些質疑和反對“學者化”的人的理由，即認為“編輯學者化”會“導致職業角色的錯位”、“導致編輯意識的削弱”和“導致編輯不安心於本職”。劉石總結道：“這一命題的提出，很容易導致編輯‘主體意識’的降低。一種堂堂正正的職業，如此堂而皇之地提出要另一職業化，除編輯一家之外，似乎未見別家。”^③不過，如果職業化果真讓學術期刊編輯成為一種堂堂正正的職業，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期刊人會“堂而皇之地提出要另一職業化”？

再次，至於劉石為了進一步說明學術水平的不重要而特地舉的錢鍾書的例子，我相信，劉石這樣說是一種調侃，但以錢鍾書為例其實並沒有多少說服力，因為，相反的例子也許能舉出更多，比如首倡“學報編輯學者化”的王英志列出的從孔夫子到毛澤東這一系列“編著合一”的大家，都是被公認為編輯楷模的。一位編輯能否尊重作者，往往不取決於其學問，而取決於其人品或脾性。在學者面前驕傲和驕縱的編輯們，或者將“引領學術”總掛在嘴邊的編輯們，真的個個都有如錢鍾書般的學問？

最後，從劉石的論證中，可以看到他雖然不認為“學者化”有何積極意義，但卻有意無意地吸納了三十年來“學報編輯學者化”討論中爭論雙方的主要觀點。之所以如此，正在於“爭論的雙方都

不敢或不願觸及造成編輯身份焦慮的深層根源——學術期刊體制所設定的致使編輯與學術共同體相分離的編輯職業化。”²⁴這個雙方不敢或不願觸及的職業化正是劉石所認同的，爭論雙方對職業化的維護，不僅引起了劉石的共鳴，而且也都為他的論證提供了資源。那麼，劉石反對“學者化”的理由還能不矛盾嗎？

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到，劉石對學術期刊編輯職業身份的“假設”是難以成立的，而假設一旦被證偽，能得到的結論就正好相反，即：學術期刊編輯是不可能成為一種職業身份的。

最後我們來看劉石的第三層意思，即學報編輯身份焦慮的由來。

如前所述，劉石並不認為職業化與編輯身份焦慮之間有何因果關係，當然也就不認為 20 年前的編輯有何身份焦慮，他眼中的編輯身份焦慮是另一回事：“今天包括高校學報在內的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倒確實是存在的，這緣於學術期刊的生存困境，這種生存困境大約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出版社和社會期刊界卻越來越被趕上市場化的不歸戰車……編輯的地位漸趨下降，八十年代以來持續多年的優越感明顯稀釋了。”²⁵顯然，在劉石看來，市場化才是編輯身份焦慮的根源。

如果這個觀點成立的話，劉石就必須解釋為什麼在沒有實現市場化改革的高校學報編輯中卻普遍存在著身份焦慮的問題。他是這樣說的：“高校學報的市場化壓力表面看似乎好些，其實存在更嚴重的問題。在大部分高校，學報本來就是邊緣化的機構……職稱評定、福利待遇等方面的狀況與一線教研人員相比有或大或小的差距。這樣，刊物收費……的現象就難免……收費還加劇了刊物在學術界甚至業界的不良口碑，導致其良性發展的難度進一步加大。更多屬於編輯個人的身份焦慮之上，還有更為整體的期刊界的職業焦慮，那就是大環境下刊物的生存問題和發展前景問題。”²⁶

這些問題當然都是客觀存在的，但與市場化又有何關係？按照劉石在這裡的邏輯恰恰可以推导出這樣的結論：帶來不良口碑的刊物收費之所以難免，並非因為市場化，而是因為編輯與一線教研人員地位和待遇方面的明顯差距，而這恰恰是職業化體制無法避免的後果。劉石把它說成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這是因為與編輯相比，他作為一位學者對這一差距的“後知後覺”。其實這些差距，除了福利待遇外，早在 1980 年代即已現端倪。

看來，劉石也不得不承認，編輯焦慮的根源還是在期刊體制，而這個體制的要害就是將編輯與學術共同體區隔的職業化。既然如此，劉石當不難理解“學者化”曾給予了焦慮中的學報編輯以多大的希望，也就不該對他們試圖通過“學者化”的路徑來建構與學者平起平坐的身份的動機有何懷疑了。至於學報編輯中為何有人質疑這一身份建構方案，只是因為他們看透了“學者化”的空想本質，“我們不得不承認，質疑者顯然更清醒，他們看到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在學術期刊的掌控權、審稿權與合法性、社會地位之間，他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²⁷所謂“清醒”，是他們明白，同時求得體制與學者的認同是不可能做到的。

四、學術期刊編輯如何走出身份焦慮？

如上文所分析的，儘管對什麼是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身份焦慮始於何時、是如何形成的，原祖傑等四位教授的看法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但都不否認焦慮的客觀存在，因而他們都對學術期刊編輯如何才能走出身份焦慮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既然要走出身份焦慮，最根本的辦法當無過於積極消除造成焦慮的原因；而對造成焦慮原因認定的分歧，必然會導致他們對走出焦慮路徑看法的不同。

在筆者看來,造成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的原因正在於學術期刊編輯職業化,凡不能觸動這一體制的編輯身份建構方案都是空想,對於學術期刊及其編輯來說,要走出焦慮,只能“主動打破與學者間的樊籬,積極向學術共同體回歸。只有期刊回歸了學術共同體,編輯才能真正成為學術共同體中的一員,這是解決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的根本途徑”。^②回歸學術共同體這一路徑,也得到了原祖傑、葉娟麗和陳穎的肯定,但他們在具體表述上還是有明顯差異的。這或許與他們都是既從事學術研究,又曾經擔任過或者仍然擔任著學報主編有關,對於學報編輯的身份焦慮和身份建構,除了理論分析以外,個人的工作經歷和人生際遇對他們觀點的形成都有著直接的影響。

葉娟麗從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與緊張中敏銳地覺察到學報體制的荒誕性:“學術期刊的編輯,必然是以學術為志業的……從理論上來講,編輯學者化……是一個假問題。”然而,“編輯與學者的身份差別在當前我國學術期刊中不僅是一個制度化的規定,更是一個現實的客觀存在……編輯學者化,就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真問題。”^③通過對理論上的“假問題”如何變成現實中的“真問題”的描述和推理,葉娟麗把問題的根源直接指向了科研體制和期刊制度:“現行的職稱評聘制度、期刊管理體制、學術評價包括期刊評價體制嚴重違背了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人為地在編輯與學者之間製造了一條體制上的鴻溝。”因此,在她看來,“如何彌合這一體制鴻溝,最大限度地解放束縛學術生產力的那些制度要素,實現編輯學者化,可以說,既是那些有志於學術的編輯的心聲,更是整個學術共同體的期盼。”^④

有著海外學術工作經歷的原祖傑同樣將編輯身份焦慮的根源指向了期刊體制:“學術期刊的編輯……應該是學術共同體的當然成員……何以還要為學者身份而焦慮不安、汲汲以求?除了當今世界專業分工更為精細之外,也與中國從1950年代以來不斷變化的人事管理制度有關。”^⑤原祖傑對中外學術期刊進行比較後指出:“當中國學術編輯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焦慮的時候,國外的編輯同行卻少見這種困擾,主要原因可能在於歐美發達國家的學術編輯在過去數百年中身份變化並不顯著,他們的選擇也是自由開放的。”^⑥因此,原祖傑指出的可行路徑是:“少些行政干預,多點順其自然,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解決編輯身份焦慮的根本途徑……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應該打破束縛期刊編輯身心自由的高校單位,讓他們回歸學術共同體。”^⑦

與葉娟麗和原祖傑相比,陳穎的觀點顯得頗為複雜。陳穎1980年代中期自大學畢業後即“懵懵懂懂成了一名學報編輯”,“一腳踩入學報門檻,身份便被固化”。^⑧但陳穎顯然不是“溫水中的青蛙”,他應該是葉娟麗所說的“進入編輯隊伍中卻仍然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這樣的人,必然會出現“身份認同危機……經歷某種希冀與痛苦並存的身份焦慮。”^⑨所幸他及時地選擇了“學者化”的道路。如今的陳穎,無論是學術成果還是學術榮譽,都已經不輸於一線的優秀學者。因此,他“深信自己已經認真實踐了‘編輯學者化’的倡導並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效”。陳穎總結道:“所謂‘學者化’既是一個理想和目標,也是提高編輯業務水平的過程與手段,更是擺脫身份焦慮提高學術地位的唯一路徑。”^⑩

陳穎觀點的複雜就在於,他一方面認定編輯的身份焦慮源於期刊體制職業化的設定,另一方面又認為在現行體制下,編輯通過“學者化”可以擺脫身份焦慮。除了自己艱辛的付出外,陳穎還分析了成功的外在原因:其一,學報編輯“兩個天然優勢”:“發表成果的近水樓台”,“開展學術研究比較充裕的時間”。其二,“所就職的編輯部具有比較濃郁的學術研究氛圍”。^⑪在筆者看來,這兩個原因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應該還在於他所在的學校對其“學者化”追求的寬容,即允許他突破“專職”的限制向編研一體回歸。陳穎也說到:“一些高校甚至對學報編輯的待遇和學術權利加以種種

限制,如規定學報編輯無權申報各類縱向課題、不能參評一些科研獎項等等。如此一來……豈能不產生身份焦慮。”葉娟麗更是列舉了著名大學對學報編輯的種種限制:“編輯失去兼職從事教學的資格……如吉林大學。……編輯工作績效……以每天在辦公室守滿 8 小時為原則,如武漢大學。”^⑧著名大學尚且如此,其他學校也可想而知了。試想,如果陳穎供職於這樣的高校,他的“學者化”之路還能走得如此順利嗎?因此,陳穎只是一條體制的“漏網之魚”。而即使所有人都能如陳穎般越過體制之網而在事實上實現編研一體,那麼,職業化體制存續的意義又何在呢?

陳穎觀點的複雜還在於,一方面,他強調“學者化”與提高編輯審稿能力具有必然聯繫,“實際上,在學報編輯的各種業務能力中,審稿能力是核心,而審稿能力又是建基於學術水平之上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專家匿名審稿與編輯‘學者化’並不矛盾,也不可能給‘學者化’路徑致命一擊……綜合性學報編輯必然要讓渡部分審稿權,專家匿名審稿乃學報審稿不可或缺的基礎環節,與編輯‘學者化’的努力並不矛盾。”^⑨所謂“學者化路徑”,就是在職業化的制度環境下,通過“學者化”建構起與學術共同體平起平坐的獨立的編輯身份,這也是 1980 年代以來所有學術期刊編輯身份建構方案的共同目標。無一例外,這種獨立身份所依憑的就是對學術媒體的獨立掌控權,基礎和核心就是編輯獨立審稿權。編輯獨立審稿權一旦失去,在不能回歸學術共同體的情況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技術編輯,與學者間的鴻溝永遠也無法填平。匿名審稿制所針對的恰恰是編輯的獨立審稿權,所以,《三十年》才指出:“近年來匿名審稿制在學術期刊界的推行並逐步剛性化則給了‘編輯學者化’身份建構路徑致命的一擊。這一路徑是建基於編輯審稿權之上的,對審稿權的過度依賴,使得這個基礎一旦被抽離,整條道路也就崩塌了。”陳穎既不否認審稿權在編輯身份建構中的基礎和核心地位,又認為讓渡審稿權不會給“學者化路徑”致命一擊,那麼,在職業化的不變前提下,這條路又能通向何方?其實,匿名審稿制所要求的審稿權讓渡,不是陳穎所說的“部分”,而是全部。而不管是部分還是全部,都意味著編輯對媒體的掌控不再可能是“獨立”的。葉娟麗對此作了深刻論證後指出:“(匿名審稿制)這種將學術審查權力外包的制度設計,更加強化了學術期刊編輯作為稿件收發中介和加工校對的角色定位……離學術越來越遠,更別提什麼學者化了。”^⑩

儘管陳穎表述了頗為複雜的觀點,但他最終還是回到了對體制的批判和對體制改革的期待:“學報編輯欲真正‘學者化’,徹底擺脫身份焦慮,只有回歸學術共同體……但最終只能寄望於期刊管理制度的改革,讓‘編研分離’重回‘編研一體’。”^⑪

劉石在學術期刊編輯如何走出身份焦慮問題上,可謂獨樹一幟,他所推重的是“編輯主體化”這一身份建構路徑,並對後人因推重“編輯學者化”而冷淡了“編輯主體化”感到可惜。他很在意“編輯身份建構”與“編輯主體意識”的關係,並且再次用了頗為特別的“假設”來論證這二者對編輯走出焦慮之意義:“假設說編輯學應當成為、可以成為、已經成為一個學科,那麼在這個學科中,迄今為止包容性強、建設性意義大的命題之一,竊以為就是‘編輯主體意識’說,因為它體現了最強烈的專業意識……編輯主體意識的體現,我的理解也就是編輯專業性的體現,這種專業性,又有更通俗地稱為編輯獨具的特殊本領……身份而需要建構,那就一定不是一個簡單的外在符號,而是內具的有異於其他職業的特殊素質。”^⑫在這裡,劉石已不再談論編輯的學術水平而只談技術了,並將之視為編輯學和編輯身份建構的核心內容。顯然,劉石之所以力挺“編輯主體意識”,是因為它是“編輯專業性的體現”,亦即“編輯的特殊本領”,強調的還是編輯與學者明確的身份分野,似乎編輯具有了編輯專業意識和特殊本領後,獨立地位就能確立,身份焦慮就不復存在了。那麼,這裡就有幾個問題需要回答:其一,這些特殊的本領究竟有哪些?是否應該包含學術和技術兩個層面?其

二,如果包含這兩個層面,堅持編輯與學者的身份分野,編輯何以具備學術層面的本領?其三,如果編輯無法具備學術層面的本領,如何獨立掌控學術媒體?如何得到學術共同體的認同?其四,即使編輯具備了這些特殊本領,就能打破體制設定而成為與學者平起平坐的獨立主體了嗎?

其實,當我們用“假設”來描繪某一職業前景時,首先要證明這個職業獨立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其次要證明通往前景的路徑是確實存在的。然而,要在學術期刊編輯身上證明這兩點卻是極其困難的。這也是出版界與學術期刊界的根本不同之處。劉石對於出版界編輯的身份建構極為認同:“正如朱劍教授所分析,‘他(指湖北人民出版社胡光清先生——引者注)是有著強烈的編輯與學者職業分野意識的’……這也是我自覺有充足理由將他提出的‘編輯學者化’看成是他編輯專業化、學科化理論探索中的一個積極命題,而不是因自矮身份欲去編輯化的所謂‘身份焦慮’的表現。”其實,《三十年》中引用的林辰的表述更加擲地有聲:“編輯就是編輯,既不是某一學科的附庸,也不是什麼多學科的雜燴,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指出,編輯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就是編輯家。”^⑧但是,“編輯家”的建構目標卻是學術期刊編輯無法移植的,這也正是王英志和楊煥章有意對“學者化”進行改造而使編輯身份與學者身份相勾連的原因。《三十年》對此已有詳細解釋,這裡不再重複,只是指出,“編輯家”身份建構的邏輯結果就是出版市場化。事實也證明了,出版界編輯在明確了“編輯家”的身份定位後,關注的熱點迅速地轉向了出版業的市場化,從而與學術期刊編輯身份建構分道揚鑣。劉石對王英志和楊煥章勾連編輯與學者身份的良苦用心視而不見,而將出版界編輯身份建構的目標投射到學術期刊編輯身上,是忽略了兩者之間的本質差別:出版社是面向大眾市場的單向傳播平台,作為作者與讀者中介的獨立編輯足以掌控;學術期刊則是作者與讀者同體的學者雙向互動的平台,必須由學者來掌控,故其編輯必須首先是學者。

更為關鍵的問題還在於,脫離了學術共同體,學術期刊編輯根本不可能生成真正的具有專業意義的編輯意識,這一點,筆者在《如影隨形》中已說得很清楚:“須知編輯意識不等於編輯技術,對於學術期刊來說,編輯意識是以編輯必須是學者為前提的,而編輯學術期刊也是學術研究的一部分而不能與之割裂。學術期刊是學術成果展示、交流的平台,同時也是學術批評的平台。這一平台掌控者的身份首先是學者其次才是編輯……所謂編輯意識,並非一定要職業編輯才會具有,尤其是學術期刊,編輯若疏離了學者,那麼,編輯意識也就無法落地生根,就會只有技術,而缺乏‘意識’,所編輯的刊物也就失去了靈魂。”^⑨這也是筆者從不看好所謂學術期刊編輯學能夠超越技術層面而真正實現學科化的原因。

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特別是高校學報編輯艱辛的身份建構之路,尤其是耗時三十年的“學者化”爭論,確實不乏“大膽假設”,可最終都無法完成“小心論證”。建構失敗的原因還是在於職業化這一不可更改的前提,編輯與學術共同體相分離已成為建構的先決條件,從而根本違背了學術期刊發展的規律。我想,這大概也是劉石只假設而不論證的原因。因此,所謂“編輯主體意識”與“編輯學者化”並非如劉石所認為的是“兩個邏輯層面、思想內涵、價值意義都迥不相同的命題”。作為以職業化為前提的編輯獨立身份的建構方案,兩者的差別僅在於,前者只不過丟棄了後者所抱持的具備學者般研究能力以求得學術共同體認同的幻想而已,在獨立掌控學術平台的訴求方面,兩者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只要職業化前提不改,這樣的建構路徑註定不可能成功;而職業化一旦鬆動,這樣的建構路徑又會變得毫無意義。

幾個月前,筆者接受“澎湃新聞”的專訪,曾就“編輯學者化”和編輯身份焦慮問題回答了記者鍾源的提問,在此,錄下其中筆者的兩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所謂‘編輯學者化’,是在職業化之後

才掀起的大討論,其預設就是編輯非學者,所以才要‘學者化’,要解決的實際上是在編輯職業化這一不能變的前提下,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定位問題……我所要質疑的並不是編輯要不要學者化,而是這一討論的前提能否成立。唯有這個前提能夠成立,討論才有意義。”對於學術期刊編輯來說,“要擺脫焦慮,唯有回歸學術共同體,這不僅是學術期刊編輯身份建構的根本途徑,也是學術期刊發展的必由之路”。⁴⁵

①劉澤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②③④朱劍:《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年學術期刊史的一個側面》,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⑤⑥葉娟麗:《編輯學者化:一個不應成為問題的真問題》,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劉石:《也談“身份焦慮”與“編輯學者化”》,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陳穎:《從“編輯學者化”到“學者化編輯”》,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原祖傑:《“編輯學者化”與中國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關於期刊體制的源頭,按李頻的說法,不僅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參見李頻:《數字時代社科學術期刊改革路徑的思考》,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國務院批轉國家出版局〈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北京:《出版工作》,1978年第12期。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國家出版局召開黨組擴大會學習討論和貫徹落實〈關於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報告〉》,北京:《出版工作》,1978年第13期。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面對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地位的提升,出版界的編輯們有一種被遺忘了的強烈感覺,“編輯人員中有一

種‘人心思院,人心思所’的情況,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比起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相差很遠。”參見柏生:

《編輯的苦衷》,北京:《出版工作》,1980年第8期。

⑬華然:《也要尊重編輯的權利》,北京:《出版工作》,1979年第11期。

⑭⑮⑯教育部:《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1978年11月15日。

⑰筆者是在《意見》發佈3年多後的1982年初進入學報界時第一次讀到這個文件的,與當年參與《意見》起草的諸位主編大多有過交往。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葉娟麗:《中國大學學報:制度變遷與路徑選擇》,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朱劍:《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2期。

⑳林辰:《從編輯實踐到理論的思考(三)——編輯明清小說的體會》,北京:《出版工作》,1986年第10期。

㉑鍾源:《訪談 | 朱劍:回歸學術共同體是學術期刊及其編輯的最好選擇》,澎湃新聞,2018年9月7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64423

作者簡介:朱劍,《南京大學學報》編審。南京210093

[責任編輯 劉澤生]